

比资源、人口和技术 更加重要的财富

——评介法国经济学家居伊·索尔芒的《新国富论》
THE MOST IMPORTANT WEALTH

“欠发达不应是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范畴，而是一个经济范畴。”

魏铁红

凡是向上和进取的社会，无不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改革的作用，而停滞落后的社会则一味夸大资源、人口和技术等外部条件的制约作用。“欠发达不应是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范畴，而是一个经济范畴。”综观世界各国改革的经验，那些模仿发达国家制度的国家都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日本、韩国为最典型的例子，而那些只模仿技术而不模仿制度的国家最终都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兼作家居伊·索尔芒在1987年发表的《新国富论》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主要是由错误思想指导下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与这些国家的文明、气候或资源没多大关系。“一般地说，那些选择走对外开放，倡导个人积极性和资本主义方式权力分散的发展道路的

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成功，而那些主张自给自足的，中央集权和强调政府作用的国家或地区都遭到了失败。”

索尔芒曾在美国和阿根廷的大学任教，所以对美洲经济认识深刻，他指出南美各国资源比北美丰富，却落后于北美的原因。南美各发展中国家由于闭关自守、中央集权和采用劳尔·普雷维什的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模式而导致贫穷。其中阿根廷最为典型。阿根廷是拉丁美洲资源最丰富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为南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今却成为惟一一个“第三世界化”的欧洲移民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已跌到与阿尔及利亚和塞尔维亚同样的水平。墨西哥也由于遵循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模式而造成经济衰退，甚至经济危机。南美各国采用贸易保护政策，使本国的产品不能参与国际竞争，生产的产品质

次价高，无法与国际同类产品角逐。例如：巴西在微电子行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生产计算机比世界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要贵两倍，而且功能差，技术落后。总之，计算机国产化的受害者首先是巴西的用户，由于他们没有采用优质低价的计算机，发展受到了阻碍。”贸易保护主义对受保护企业只能提供短期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对受保护工业的发展只有坏处。这些受国家保护的“襁褓工业”，由于不能参加国际竞争，逐渐失去了同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竞争的能力。正如詹姆斯·L·多蒂所说：“没有不加约束的竞争力量来显示一个企业经营的正确信号，受保护的工业不久就会成为死亡工业。”贸易保护政策只保护了少数企业的利益，而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其他企业的利益，从长远来看整个国家的利益都遭到了损害，而“襁褓工业”也

没有民主的经济自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荒唐的

将永远长不大。

索尔芒在书中说：“国家的贫困并非命中注定，而是错误思想影响下的错误政策的结果。这种错误的思想尽管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但总是认为，政治领导人及其赖以生存的强大的国家、军队、国家企业是进步力量的所在，而私人产权保护、批评精神都是落后的。但是在考察中，我们逐渐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无论属于哪个大陆，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它们所经历的变化恰恰导致相反的结论。”南美与亚洲欠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作者考察智利的圣地亚哥时，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说：“没有民主的经济自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荒唐的。”

在智利，“芝加哥小子”们试图把市场经济与政治专制结合起来的实验失败证明了这一点。皮诺切特上台后启用留美学生“芝加哥小子”，把银行财政有关技术方面的责任委托给他们。“芝加哥小子”把智利当成了他们的“实验室”。“事实上，他们的实验从一开始就走入了歧途，原因在于皮诺切特只把不危及他权力的部门交给他们，如价格自由，汇率自由，或者退休基金管理，公共部门本身仍动弹不得。自由派提出的取消财政部对中央银行的控制这一点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银行、钢铁、能源、电讯、运输、电视等部门一直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果实验失败也是必然的。从智利的例子可以看出，单纯改革经济而没有适合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环境，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适合自由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权力分散、法制民主的环境。

作者在《新国富论》中指出，非洲的

贫困饥荒是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太低，使农民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而只满足于自给自足。象牙海岸是非洲惟一自独立以来GNP有明显增长的农业为主的国家，原因是国家领导人指定了一个虽然较低，但仍能刺激农民多生产的农业收购价格。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对农牧业都采取一些补贴政策，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发达国家的农牧业发展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国家。南美国家采取普雷维什理论，首先实现工业化，用农业补贴工业，结果是农牧业与工业一起衰退。除了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民的利益，还必须用二三产业的收入补助农民和农业，免除农业税，农业才会发展，第三世界才能摆脱贫困。

索尔芒又指出：现代化在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是可行的，包括最保守的文明。他举了韩国的例子，这种文明曾被认为是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韩国地处地球上冬冷夏热的一个死角，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价值观念保守消极，轻视商业，人口众多且80%都是文盲，没有工业，只有传统的农业，它也从接纳经济上活跃的外乡人，并且历史上深受外国殖民者的残酷剥削。直到1961年，专家们仍认为它毫无希望，但今天的韩国已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韩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造成的弊病很多，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泛滥等，但韩国的发展速度仍然远远超过了那些基础条件比较好的、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

索尔芒又通过对印度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在政策上保护农民的利益，尽管人口众多，也可以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印度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后，由六十年代的饥荒国家发展成为粮食自给自足并有余粮的国家。美国的农学家博劳格认为，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和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事实上早就掌握了养活第三世界和应付未来人口迅速增长的技术，宣告了马尔萨斯理论的破产。“人口过剩并没有引起贫困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无论是韩国、新加坡、泰国，都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而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如坦桑尼亚、玻利维亚却是人口不足的国家。”饥荒和贫困不是由于人口过剩，而是由错误的政策、盘剥农民的利益导致的。正如索尔芒所说：“限制生育的政策归根到底只是承认失败的供词，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消除饥荒，也没能使人摆脱贫困。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和教育，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才会自愿少生孩子。”

从《新国富论》中人们可以认识到，自由资本主义是好的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坏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创业的垄断、外汇管制和投资集中决策的基础之上，如巴西、印度和韩国模式。国家注意发展的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强大的工业和与政治集团紧密相连的新兴资产阶级，不尊重个人，不注重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广大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建立于资本和权力关系上而非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之外。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贪污腐败泛滥，社会不公正加剧。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注重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轻

视农业和服务业。

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使全体人民都参与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知识技术水平。发展资本密集的大企业则是由国家政权、而不是私人企业家带动的，不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型企业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企业破产或低效运转，外债和通货膨胀严重，最后造成经济衰退。如巴西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贫富分化严重，四分之三的人口被排斥在这种以大规模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之外，使巴西成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巴西已由世人称羨的“经济奇迹”变成供人吸取教训的典型。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实行“官制金融”，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崩溃，苦不堪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是：韩国大企业集团——“财阀”都是由家族控制的私有公司，官商勾结，政府高级官员往往直接参与对企业的贷款活动。各大“财阀”片面追求利润增长，大量投资，强力出口，国内政策则高储蓄，高投资率，大举借债经营。“财阀”变本加厉地向传统领域大肆进行重复投资和盲目投资，造成企业效益越来越差，纷纷倒闭，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无法收回而形成大量呆账和坏账，银行对外贷款的信用度大降，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则采用权力分散和民主开发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台湾就是一个例证，建立在国际竞争和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发展更注重劳动力的作用，从而使全体人民都参与了经济增长，在致富的同时，社会公正也得到

了同步发展。这种自由模式被证明是最有效、也是最合理的。”作者论述台湾地区的发展时讲到，“台湾地区经济起飞主要由于它在对外贸易上从替代进口战略迅速转变到‘出口导向’战略上来。为发挥比较优势，1958年台湾地区进行了货币改革，降低了货币的对外币值，储蓄利率采取了有

利于储蓄者的正利率，造就了一个有能力确保自我经济安全的中产阶级，使资金大量涌入银行，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这样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也使收入均等化，把发展与社会公正协调起来。中产阶级的增产也同时推进了民主进程。”

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在其第一阶段会使社会最底层的人更加贫困。如英国从18世纪中期到1860年就是这样。而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例如，1860年以后的英国和1926年以后的日本，贫困在各个社会阶层中迅速消失。马克思的《资本论》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持有库兹涅茨观点的人认为《资本论》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而不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的新加坡、台湾、香港来说，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没有使任何人更加贫困，从一开始，它就使最底层的人比富裕的人富得更快。库兹涅茨的理论受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挑战。而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仍以库兹涅茨的理论为借口，认为生产先于分配，发展与公平不可兼得，其实质在于各国官僚层和利益集团不



阿根廷由于经济崩溃而引发工人罢工游行。

肯放弃既得利益和“特权”，不彻底改革政治、经济制度，为权力市场化造成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高度腐败、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社会动乱等等进行辩护。从亚洲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不发达的国家只要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完全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不发达国家的出路在于模仿制度。不存在只适合某一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只存在适合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原则。发达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和分权体制是适合一切国家的政治体制。现代发达国家一般采用约翰·洛克的三权分立主体体制，他们的实践证明洛克的分权思想是正确的，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各式各样的专制政体，所以几十年也走不上正确的道路，仍徘徊在欠发达国家的行列。而那些采取政治上多元化，倡导个人积极性、权力分散、民主法制和批评精神、经济上主张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国家，都会走向富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②

(责任编辑：史易灵)